

DOI:10.3969/j.issn.1007-4074.2013.05.016

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与“范式转型”

——以 E. P. 汤普森为中心*

邹 赞

(新疆大学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 E. P. 汤普森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对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定义展开批判, 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定义的多重面向。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积极从欧陆寻求理论资源, 引发与英国本土以经验为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争。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不仅偏离了利维斯主义狭隘保守的“文化”观念, 将文化的意涵进一步扩大到日常经验, 并且重视“文化”作为激进政治载体的抵抗潜能。同样, 围绕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经验”与“理论”的思想交锋, 既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范式转型, 也为当下学界重返伯明翰, 进而理清文化研究的理论系脉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关键词: E. P. 汤普森; 社会历史学; 文化马克思主义; 结构马克思主义; 范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3)05-011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ZW006); 新疆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BS120221)

作者简介: 邹 赞, 男, 博士, 新疆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

作为一个指称, 英国文化研究从来就是差异丛生、众声喧哗的“复调合声”, 即使是名声显赫的伯明翰学派, 其内在的分歧与论争也几乎从未消停过。可以说, 不同思想观念间的论辩、交锋、对话, 恰恰构成了文化研究保持活力的源泉, 并激发愈来愈多的思想话语进入公共场域, 为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在英国文化研究早期被称之为“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中, E. P. 汤普森以社会历史学家的身份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声, 对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定义展开批判, 并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 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定义的多重面向。

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出版后, 英国知识界反响强烈, 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长期革命》。该书尝试将文化分析“理论化”的意图尤其遭到诟病, 被指责的症状还包括“社会学色彩太

浓”, “故弄玄虚的理论滥用”, “欠缺恰当的批评方法”等等。在这些批评声中, 汤普森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撰写了一篇言辞激愤的文化“批判书”, 刊登于1961年的《新左派评论》(第9、第10期)。这篇论战檄文被奉为经典文献, 至今仍然对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汤普森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威廉姆斯在论述大众出版物时忽略了工人阶级运动研究史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特性, 出版物与民众运动的关系, 所有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1]176}。考察对象多有纰漏, 比方说在分析1840年代的文化时, 完全没有涉及颇具影响力的工人阶级报纸《北方之星》(Northern Star); 择取的视角和对象也比较武断, 并且用主导/从属的情感结构概念“遮蔽了冲突之所在, 最大可能地缩小了缺陷和失败”^{[1]177}。主导的社会特征和日常经验的丰富性被一系列因素伪饰起来, “整体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研究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比如

* 收稿日期: 2013-08-14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威廉姆斯对“阅读大众”(reading publics)的表述就陷入了同质化的陷阱,因为“总会存在许多种阅读大众群,他们之间的区分不仅根据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的差异,而且十分关键的是,还依据生产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来划分”^{[1]178}。其二,威廉姆斯忽略了欧陆理论,特别是“从维柯经由马克思到韦伯和曼海姆”^{[1]179}的传统。即便是就英国本土而言,其视野也显得过于狭隘,而文化的人类学定义需要参照多个领域的理论资源。其三,威廉姆斯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传统,在谈及“工业”和“民主”时,未能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表面看,威廉姆斯仿佛同马克思主义处于持续性的论争中,但他“从未直接面对马克思”^{[1]179}。在考量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威廉姆斯规避了一点,即“马克思提供的不是一种艺术理论、政治理论或经济理论,而是一种有关历史变迁过程的历史理论”^{[1]180}。威廉姆斯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技术还原论,汤普森也同意“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过于机械,但认为批判必须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此外,威廉姆斯对工人阶级激进读物,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履行的职责关注不够,这既是他的“文化”定义缺少斗争维度的原因之一,也体现出威廉姆斯前期思想中的某些保守主义之处(丹尼斯·德沃金语)。最后一点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汤普森认为威廉姆斯一面批判了利维斯与艾略特,一面又受到他们的影响,“文化定义中都没有涉及权力与冲突”^{[1]184}。汤普森继而设想:“如果我们变动威廉姆斯定义中的一个词,从‘生活方式’变为‘生长方式(way of growth),我们就能从一种消极的、非个人的定义转向一种积极的、能动性的定义。如果我们再次变更这个词,祛除‘生长’所暗含的‘发展’(progress)之意,我们就可能得到这样一种定义:对一种整体冲突方式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种冲突方式就是一种斗争方式,这样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1]185}可以说,汤普森正是在批判威廉姆斯著作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文化观念。简言之,他认为文化应该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将总体性理论与阶级政治妥帖地勾连起来。

汤普森对威廉姆斯的严厉批评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政治生态,即霍尔所主张的支持在新左派内部发表不同的声音。汤普森既反对利维斯主义的精英式文化定义,也无法接受威廉姆斯那种定义文化的“进化论方法”(evolu-

tionary approach),他“坚决捍卫文化的历史独特性(specificity),复数性而不是单数性,是 cultures 而不是 culture。最关键的是,他坚持不同文化间的斗争、张力和冲突,以及它们与阶级文化、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联”^{[2]20}。汤普森反对将工人阶级文化经验同质化、浪漫化、理想化,希望引入阶级政治的维度,引导新左派由一种文化政治走向现实的政治斗争。

汤普森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重视阶级斗争,强调以自下而上的视角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呈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别具意味地采用了单数概念的“工人阶级”和动态词汇“形成”(make)。前者表明工人阶级尽管存在着基于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生活境况等因素造成的内在差异性,但这个历史化的指称更加强调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与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共同阶级意识;后者则突显出阶级是一个由主、客观因素共同推进的动态形成过程。汤普森试图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去挑战经典马克思主义,他拒绝接受经济决定论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彰显“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通过爬梳 1790—1830 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斗争经验,汤普森发现工人阶级对社会的不满是超越物质层面的:“引起最强烈的感情的往往不是‘面包和黄油’的简单问题,而是价值观念的问题,例如传统习惯,‘公正’,‘独立’,‘安全保障’等”^{[3]221}。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的或过分直接的因果关系”^{[3]193}。汤普森认为马克思、汤因比、韦伯、哈孟德夫妇在阐释工人阶级形成时的观照视角过分拘囿于社会生产方式,忽略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3]211}。

汤普森的特别之处还表现在逆反正统史学的研究模式,从底层的日常生活与斗争经验考察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塑形。传统研究视野下的工人阶级往往处于社会结构的消极被动层面,是一个被遮蔽、被压抑的不可见的群体,汤普森试图改变“有产阶层”形成的关于“下层社会”道德败坏、粗俗无聊的定型化想象,突显出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对历史发展进程作出的贡献,“如果我们对历史的变革感兴趣,那么我们须考查这清晰的少数。但这个少数是从不那么清晰的多数中浮现的,这些多数

的意识在此时可说是‘亚政治的’即由迷信或不自主的非宗教状态、偏见和爱国主义所构成”^{[3]221}。有意味的是,汤普森关注到手工工人才是劳工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作为社会激进力量的核心场域,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劳工运动’。工业革命最初只要求人们去描述,现在却要求人们来解释”^{[3]192}。

此外,汤普森将日常经验、阶级意识与激进主义政治勾连起来,一方面强调大众出版物之于激进主义政治的意义,一方面重绘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地形图,赋予文化一种抵抗霸权的量能。汤普森综合调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从档案、会议记录、手稿、通信、报刊、政治宣传手册等多元渠道广泛搜集材料,具体论述涉及农业工人和手工工人的饮食、住家、健康、宗教道德、闲娱娱乐等方方面面,试图从宗教意识形态、日常生活、阶级斗争、法国革命等主客观因素探析工人阶级道德情感和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揭示出“工人阶级不仅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3]212}。在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以大众出版物为载体的激进主义文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卡莱尔呼吁出版自由,欧文将工业革命的经历与大众的激进主义提升为理论,再加上工人读写能力的明显改善,《黑矮人报》、《人民之声报》、《挑战者》、《毁灭》等刊物“尽管……并不宣称自己是‘激进的’,但却迎合了广大激进派公众的需要”^{[4]845}。

最后,汤普森勾描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手工工人的民间文化习俗,诸如集市、节庆、独特的民间仪式等,他们继承传统并有所创造,这些被汤普森认为是英国最引人注目的大众文化以匿名信、焚烧模拟道具、迅速行动等表征方式绘就了一幅“道德经济学”图景。工人阶级正是凭借这些丰富的日常经验、大众文化与激进主义政治,书写出一种截然不同于浪漫主义批判的“激进抵抗”模式。

二

如果说,以霍加特、威廉姆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第一代新左派通过重构一种“文化与社会”或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再度发掘工人阶级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有效消解了文化的等级制度,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与英国“文化-文明”传统形成明显的“断裂”;那么,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

左派则积极从欧陆寻求理论资源,欧陆理论的涌入与英国本土以经验为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剧烈的张力关系,由此引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争,这显然构成了又一次“断裂”。

两代新左派的“宿怨”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的“人道主义”论争。安德森尤其反感第一代新左派所鼓吹的人道主义与“积极中立”原则,认为其经验主义色彩过浓,理论极端贫乏,无法为1960年代勃兴的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提供有效阐释。此外,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大分化——中苏关系破裂、古巴革命兴起、英国核裁军运动式微、越南战争等等——使得安德森愈发感到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偏狭无力,寄希望从欧陆引进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从而改变新左派“理论贫困”的现状。

尽管英国左翼知识界在1930年代就接触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是直到1960年代初,英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仍然相当陌生,仅有的一点了解也是借道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家对于阿多诺文化工业悲观论的批评。1962年,安德森接替霍尔担任《新左派评论》主编,开始大量译介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安德森命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评论》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翻译和出版大陆思想家的作品,他们坚信在政治进步成为可能之前,英国偏狭的和经验主义的知识文化必须先被改变。从1963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中期,它出版并讨论了许多欧陆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包括萨特、葛兰西、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5]21}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伦敦新左派丛书”(New Left Books)和梅林出版社(Merlin Press)译介了卢卡奇的《历史小说》、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和萨特的《方法问题》等。大规模的理论引介迫使英国文化研究“首次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另类理论资源……这些文本标志着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关键的‘断裂’,走向一种复合体的马克思主义”^{[2]25}。

此外,安德森专门撰文分析英国陷入当下危机的根源,试图从历史与社会结构层面证实英国欠缺产生本土马克思主义的合适土壤,进而为引介欧陆理论资源提供合法性。这篇引发安德森与汤普森长达二十余年论战的文章名为《当前危机的根源》(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刊发于1964年的《新左派评论》。其中提到几点重要看法:首先,英国经历了最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都落后于

欧陆国家。通过与欧陆国家比较,安德森认为英国的当下危机表现为几种消极因素的纠结,“往昔的创伤,当下的不自信,过去和现在的民族文化”^{[6]36}。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说,英国当下面临的危机是社会结构持续性衰落的结果,具体症状表现为,“毫无生气的经济,病态且衰退的教育,了无生机的都市环境,士气低沉的统治阶级,恶劣的文化乡土气”^{[6]50}。“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英国思想文化的进步,而早期新左派运动恰恰欠缺的就是未能对英国社会结构做出全方位分析,因此陷入了人道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窠臼。其次,安德森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原因归结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早熟。这种独特模式的社会结构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预设,也不适宜培植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

安德森关于英国社会历史的判断及其对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的批评,一方面公开否决了后者认为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乐观基调,另一方面开启了吸纳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理论转向”,形成了针对文化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全方位挑战。这种发自英国新左派内部的“反叛行为”自然会遭到“文化主义”和“历史学”支持阵营的声讨,汤普森于次年发表回应文章——《英国的特殊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严厉批评第二代新左派对于欧陆理论的空前热情。

汤普森的批判锋芒直指安德森接任下的《新左派评论》,认为此时的新左派已经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是一种“新”新左派,其主要活跃领域表现为“第三世界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以及安德森和汤姆·奈恩那些分析英国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宏大计划。汤普森首先批评“安德森-奈恩模式”^①机械地照搬法国的情况,既不切合英国的实际经验,也不熟悉英国的社会思潮,“18世纪晚期英国思想意识的独特贡献并非传统主义或者经验主义,而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亚当·斯密最为知名”^{[7]254}。汤普森认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将18世纪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

本主义转化为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7]255}。其次,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所需要的理论资源应当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假如安德森和奈恩想在近期以一种过于自信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来颠覆‘经验主义’,即便这种体系经过了一些新鲜词汇的粉饰,他们也犯下了可悲的错误。我们绝不允许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磨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造性冲动。他们的计划无法驾驭宏大的现实问题,除非有一种可以用英语习语进行对话的马克思主义,否则英国不太可能‘俯首称臣’”^{[7]274}。再者,汤普森指责“安德森-奈恩模式”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叙述存在诸多不足,“不能理解观念与选择的政治语境;分析中欠缺严肃的社会学维度;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极端庸俗化理解;忽略了共产主义对于英国劳工运动的重大影响”^{[7]275}。导致上述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英国的特殊性重视不够。最后,汤普森总结出走向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一是革命模式,用阶级制度取代国家机器……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了。二是带有社会主义战略的政党,通过改革的累积达到革命性的过渡。三是通过历史性阶级更为广泛的社会构成的变化,带动旧有阶级制度和价值体系的突破”^{[8]56}。

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这场著名的思想论争既是两代新左派内在分歧的激化,也是英国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的首次正面交锋,论争的议题聚焦于如何重估英国的社会历史与社会结构,如何考量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民族文化传统间的关联,如何规划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应当说,安德森明显忽略了19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对人道主义与经验主义怀有一种紧张不安的“俄狄浦斯焦虑”,认为文化问题不可能在经验层面得到妥善解答,必须放置到社会权力结构中加以观照。与之相对的是,汤普森始终坚持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本土立场,主张在充分重视英国社会历史独特性的基础上考量文化的日常实践意义与个体在历史中扮演的能动角色。汤普森

① “安德森-奈恩模式”是指1960年代初,安德森与奈恩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撰文反思英国的历史与社会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批判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的知识分子实践,主要观点涉及:(1)工党主义导致工党未能形成一种“领导权”概念,包括与其他阶级结盟,创造出一支可以取代保守党的“民族-大众”;(2)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级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在英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工党欠缺学术和理论上的领导能力,致使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要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3)以法国为“模型”,突显英国的例外性,英国的进步政治需要与以往的知识分子实践和文化习语决裂。参见[英]迈克尔·肯尼:《社会主义和民族性问题:英国新左派的经验教训》,王晓曼译,孙乐强校,载《学海》2011年第2期,第134-140页。

后来回顾自己与安德森论争的原因,这或许可以提供更加明晰的解释,“我很看重文化,而安德森看重权力。我想,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不认为与历史有关,而是不同类型的历史意识。如果你读他的著作,你会发现,安德森很关注权力与结构,很少关心文化与经验的内在性质”^①。

三

在1960—1970年代的理论引介浪潮中,阿尔都塞受到了英国思想界的极力推举。作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者与替代者,阿尔都塞通过重读马克思经典论著,发现:运用语言论转向过程中携生的结构主义方法展开对马克思论著的“症候阅读”,不仅可以阐释其文本层面的意义,还可以深究那些“裂隙”、“空白”和无意识层面的涵指。阿尔都塞主张以科学性概念去重新发掘马克思理论中的“认识论断裂”,这种断裂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都可以归为马克思“断裂时期”的著作。这种划分有助于纠偏学界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唐突地将青年马克思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合理的做法应当是细察马克思前后思想产生的复杂历史情境及其内在差异。阿尔都塞一面反思学界对于马克思本人理论的误读,一面援引恩格斯对“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特别澄清,阐明一种“多元决定论”与“相对自主性”思想:经济因素虽然起最终决定作用,但它并非单独起作用,必须和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

阿尔都塞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展开了深入批判。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概念与纯属意识形态范畴的“人道主义”并置在一起,不言自明地呈现出理论上的不平衡性。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9]230} 鉴于意识形态的独特性,阿尔都塞无情地嘲笑了那种过分鼓吹主体性以及个体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的观点,“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手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在其使用过程中,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9]231}。意识形态具有能

动和建构潜能,可以将个体询唤为主体,这样一来,“虽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这一意识形态存在的正当理由不能为不恰当的理由作挡箭牌,否则我们就会把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混淆起来”^{[9]239}。

阿尔都塞以其“症候阅读”、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概念和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立场,为英国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的思想资源。对英国新左派而言,“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对并没有陷入经济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一种非斯大林主义的替代物。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后期新左派对理论工作的关注合法化了”^{[5]24}。对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来说,阿尔都塞以非还原论的方式重构“决定模式”,使得文化问题由“基础—上层建筑”体系的观照转向意识形态视角,这种阐释路径重视文化意识层面的相对自主性,将文化置于一个复杂的总体结构中加以考量,发掘其中的结构性张力与意指实践,为读解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媒介文本、青年亚文化、少数族裔文化、性别政治等提供了有效的话语资源。霍尔本人就深受其影响。1971年,霍尔向英国社会学联合会提交了名为《异常行为、政治与媒体》(Deviancy, Politics and the Media)的论文,其间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痕迹清晰可循,该文尝试运用巴尔特、阿尔都塞、葛兰西的理论建构一套不同于美国实证主义模式的媒介批判路径。1978年,霍尔领衔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这本重要的集体著作堪称阿尔都塞理论影响下的一次有效实践。阿尔都塞理论的介入推进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结构主义转向,“理论家们都逃离文化主义潜在的排他性和倒退倾向,因为它赋予某一种预先确定的工人阶级文化以特权,也因为它不能解决媒介化和消费主义对阶级认同观念的冲击”^{[5]22-23}。

应当说,结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势理论话语,很大程度上是1968年学生运动和社会革命在文化和思想上产生的结果。当这场以行动实践为特色的反战后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革命在欧陆和美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英伦却是截然不同的另

① Henry Abelove et al (eds.) Visions of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6. 转引自张文涛:《析 E. P. 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之间的争论》,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第59页。

一番景象,左翼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疏离于社会运动之外。即便是威廉姆斯以第一代新左派的身份出面,试图联合两代新左派的力量共同签署《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借此缓和彼此间的矛盾,但因为与激进学生组织之间存在隔阂,终究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当1968学生运动失败后,左派阵营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展开批判,认为萨特式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不适宜当下的社会情势,结构马克思主义迎来了发展契机,“随着20世纪70年代向前迈进,结构主义方法的信徒们预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更少地卷入政治事件的形态来临了”^{[10]7}。在这种情势下,阿尔都塞的影响力急剧上升,“阿尔都塞趁势利用了当时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声望,旨在‘恢复’马克思的地位,即恢复在他的那个时期之前的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地位”^{[10]7}。

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论著,在反经验主义、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融入经济分析的维度。这也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顺应社会情势,关注视角由早期的文学和美学转向经济与政治制度改革,其地理位置也发生了重大转移,从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移向说英语的地区,以至于在1970年代,“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11]24}。

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一方面受到青睐,一方面也遭受文化主义者诟病,并最终招致了汤普森的激烈批评。有意味的是,当威廉姆斯日益靠近马克思主义之际,汤普森却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归社会历史学,这种转向可以视为汤普森撰写《理论的贫困》的深层原因,更为直接的诱发动机应当追溯到约翰逊。约翰逊在《历史学家工作坊》发表文章,指责汤普森“偏爱经验而忽视理论”,这种挑衅很快就激起了文化主义阵营的强烈反驳,“大家纷纷指责约翰逊历史知识匮乏,是一个卑屈的阿尔都塞主义者,一个苍白空洞的理论主义者”^{[12]58}。作为对约翰逊的回应,尤其是对理论主义和结构主义转向的忧虑,汤普森撰写长文,全面批判了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1978年,汤普森发表《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批判已然成为时尚的阿尔都塞理论。汤

普森首先批评阿尔都塞未能在“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做出任何调和,阿尔都塞试图以非历史主义的理论主义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尝试“在首度检验中就透露出其唯心主义性质……倘若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唯心主义,而且带有许多神学的属性,那么,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捍卫理性本身”^{[7]4}。汤普森接下来将关注重心聚焦于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For Marx)和《阅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从四个方面展开批评攻势:(1)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拘限在极为有限的学术领域,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2)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没有给“经验”留出位置,假装与知识生产内在的以及马克思本人实践中的经验性证据进行对话的样子,故而不断陷入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派定的唯心主义思维模式;(3)未能很好地与经验主义展开合理的对话,以荒谬可笑的方式误传历史唯物主义;(4)对历史主义的批评在某些方面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态度如出一辙,尽管结论不同^{[7]4-5}。因此,“有关其他重要范畴如‘经济的’和‘需求’时,阿尔都塞只能缄默不语了……只能以最抽象和理论的方式应付有关价值、文化与政治理论的问题”^{[7]5}。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总体性评价则无异于谩骂:“简言之,阿尔都塞主义就是降低到理论范式的斯大林主义,它最终就是被理论化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7]182}。

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捍卫英国本土的文化主义,反对唯理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全方位转向,一方面反映了汤普森本人后期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折射出英国反智主义传统的当代影响。显然,汤普森的执著与1970年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旨趣形成鲜明反差,霍尔和约翰逊同时出面批评汤普森的激烈言辞,由此可窥结构主义范式已经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占据了强势话语权。1980年,安德森发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论争》(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针对“历史学家工作坊”的论争以及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激烈言辞作出了总体上的回应,议题关涉“历史编撰”、“能动性”、“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国际主义”等等,反思英国思想界当时面临的究竟是“理论的贫困”还是“战略的贫困”,可谓对前述论争的一次全面总结。此后,伴随着撒切尔夫人执政,新自由主义在英国兴起,左翼知识界和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都将批判的对象转向“撒切尔主义”。至此,汤普森与安德森长达二十余年的论争终于偃旗息鼓。

综上所述,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不仅偏离了利维斯主义狭隘保守的“文化”观念,将文化的意涵进一步扩大到日常经验,并且重视“文化”作为激进政治载体的抵抗潜能。同样,围绕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经验”与“理论”的思想交锋,既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范式转型,也为当下学界重返伯明翰,进而理清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在这些思想论争中,E. P. 汤普森始终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尽管汤普森主要活跃在社会历史学领域,并没有直接参与 CCCS 的工作,但只要联系到汤普森亲历过的文化论争与范式转型,其作为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者意义,丝毫不逊于威廉姆斯或霍加特。

参考文献:

- [1] E.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M]//JESSICA MUNNS & GITA RAJA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5.
- [2]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M]//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 PAUL WILLI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 - 79, London: Routledge, 1992.

- [3] [英]E. P.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M]. 钱乘旦,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4] [英]E. P.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M]. 钱乘旦,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5] 张亮.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6]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J]. New Left Review, 1964(23).
- [7]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M]. London: Merlin, 1978.
- [8] 张文涛. 析 E. P. 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之间的争论 [J]. 山东社会科学, 2008(11).
- [9] [法]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10] [英]D. 麦克莱伦. 历史与现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J]. 陈亚军,译. 世界哲学, 2005(1).
- [11] [英]佩里·安德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 余文烈,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 [12]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责任编辑:栗世来)

On “Cultural Controversy” and “Paradigm Transition” in Early British Cultural Research

——Focused on E. P. Thompson

ZOU Zan

(Centr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chi 830046,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Combing the formation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 E. P. Thompson criticized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by Raymond Williams, thus enriched the multiple aspects of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The new left wing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represented by Perry Anderson, actively sought theoretical resources from the continent, so it cause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debates with cultural Marxism in Britain. The “cultural controversy” in early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not only deviated from the narrow and conservative “cultural” concept of Leavisism, enlarged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e” to cover daily experience, but also regarded “culture” as a resistant potential of drastic political carrier. Likely, the debate between humanistic Marxism and constructive Marxism, and that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heory”, not only led to the internal paradigm transition, but also opened a window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systems in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 E. P. Thompson; social historiography; cultural Marxism; constructive Marxism; paradigm transition